

# 大英博物館

與

## 大時代的脈動

王曾才

### 前言

大英博物館屬世界級的博物館，有「博物館中的博物館」(Museum in Museums) 或「世界博物館」(Universal Museum) 的稱號。它從一七五三年創立時僅有七萬餘件收藏品，參觀人數寥寥可數；到現在超過七百萬件收藏品，參觀人數每年多達五百五十萬人次。尤其是，它的宗旨是「保存和詮釋人類的歷史」，收藏項目不侷限一隅，展覽品包括了史前到現代的東西，它們營造出特殊的氛圍，這也許是啓發H.G. 威爾斯(H.G. Wells)在一八九五年出版最早的科幻小說《時間機器》(Time Machine)，提出藉由「時間機器」或「時光隧道」來穿越古今的靈感。二〇〇三年這個萬人注目的博物館歡慶了它的二百五十週年，「回首來時路」和展望未來時，讓人感覺到無限的追思和關切。現在此時此地正由故宮博物院來主辦「世界文明瑰寶：大英博物館二百五





馬嘎爾尼爵士銅版畫像



大英博物館—大閱覽室

十年收藏展」，也是兩個世界級博物館的攜手合作，誠為世界文化史上的盛事和佳話。說到這裏，個人也想起自己與這兩大博物館的一些緣份。以故宮言，這裏度藏太多太多我和許多許多人所喜愛的珍品，這裡有我很多的好友在此工作，把它當作志業，付出了他（她）們最寶貴的時間和精力。對大

英博物館而言，一九六〇年代，我留學英國，曾在它的大閱覽室（Reading Room）閱讀過許多資料，我也曾經是該館所在地 Great Russell Street 附近小旅館的常客。另一件事是一九九二年十月九日，我曾趁來倫敦大學參加討論英國第一位奉使來華的大使馬嘎爾尼的學術會議之便，代表我教育部與當時的館長安德生（Robert Anderson）和當時英國國會議員及前教育部次長波義遜（Rhodes Boyson）共同主持一個為紀念英國派使來華兩百週年在「大英博物館所舉辦的一個叫作「英國對中國的第一印象：馬嘎爾尼奉使北京皇廷，一七九二—一九四」（Britain's First View of China: 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the Peking Court, 1792-94）的開展。我之所以參與其事，是因為當時教育部曾出資贊助大英博物館的該項活動。因此今天有機會在此略抒淺見，覺得是這種緣份的持續。

大英博物館之有今日，自

然有它的背景，在英國能夠興起這樣的博物館，除了英國和英國人自身的條件以外，大時代的因素是其中非常主要的因素，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因素。現在的大英博物館也正面臨新的大時代的挑戰。這些是我們今天想討論的課題。

## 成就大英博物館的時代背景

英國自歐洲中世紀時代建國以來，原無足輕重。一七九三年（清乾隆五十八年），乾隆皇帝在接待英國大使馬嘎爾尼並遣其回國時，在嘉許英王喬治二世（George III）的「敕諭」中還說：「爾英吉利世居西瀛，地隔重瀛，名不隸於職方，事罕徵乎史冊。」所謂「瀛」，它的意思是「海的分支」。它是說：英吉利位於西方外海的一個海灣的地方，其地極不重要。本來，在十六世紀海洋時代肇端以前，海洋代表陸地的窮盡之處，所謂「天涯海角」，那是人世間的隔阻和絕途。但在海洋時代，海洋是通

衢大道，是無限和無盡的藍色通路。當時，中國雖是大國，但它是一個陸鎖的國家，對這種情勢是缺乏認知的。

事實上，這個時候，英國早已不是位於西瀛的小國。自從「地理大發現」（包括美洲和全程東航水路的發現）以後，人類歷史進入大西洋時代，歐洲成爲世界的中心，於是「歐洲的擴張和世界的歐化」（The expansion of Europe and Europeanization of the world）成爲近代世界史的主調。英國所處的「西瀛」變成了歐洲在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乃至於法國以後，向外發展的急先鋒。一五八八年英國在戰敗西班牙無敵艦隊（Invincible Armada）以後，便次第建立了海權及「不列顛掌控七洋」（Britannia rules the waves）的地位；十八世紀中葉以後，英國成爲第一個工業革命的國家。於是，海權加上工業，成爲英國向外擴張及殖民的最大力量。

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英國已經從七年戰爭（一

七五六—一六三）勝出，打敗了其最後也最強的殖民競爭對手法國，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乾隆敕諭英王時，英國已經攀上帝國的巔峰，不再是什麼「西瀛」的小國了。事實上，英國人打造成一個比其本土大一百四十倍的大英帝國，這個帝國在一九一四年時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和四分之一的人口，它的範圍無遠弗屆，舉凡美洲、亞洲、非洲、大洋洲皆網羅在內，成爲一個「日不落」的帝國。

英國控有了這麼廣闊的疆土，也自然地掌握了各種形形色色的資源，在它統治下的各地人民，也就像不能安心擁有他們的自然資源一樣不能長保其文化財。英國人除了在這個大帝國內，可以予取予求之外；在帝國光環的籠罩下，在別處也是得心應手。同時，國內物阜民豐，社會安定，自一六五一年後不再有過內戰，光榮革命（一六八八—一八九）建立了可大可久的政治制度。十七世紀以後，出色的收集家輩



大英博物館鎮館之寶—額爾金大理石精品

出，如斯隆（Hans Sloane, 1660-1753），他在一七五三年死後收集品轉入政府，由國會立法成立大英博物館；另一收集家克里斯提（Henry Christy, 1810-1865），死後遺囑將其收集品贈大英博物館，使大英博

物館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一八八〇年，大英博物館把所藏博物標本分出，另行成立自然歷史博物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它專藏考古文物；一九七三年它再把書籍及手稿分出，另行成立大英圖書館

（British Library），但大閱覽室仍屬大英博物館。此外，英國有英法海峽天塹的屏障，其國防安全，此與其他動輒受外患威脅而無法保全自己文物的國家不同。例如，古希臘雅典人在其衛城（Acropolis）所建奉祀其守護神雅典娜（Athena）的巴特農神廟（Parthenon），為建築與藝術的瑰寶，現僅留一個兩邊各有十七個圓柱，兩端各有六個圓柱，共有四十六個圓柱的廢墟。但它原有當時頂級藝術家用象牙及黃金所雕刻的神像，其原有三角牆下邊與框線上邊之帶，以及門廊等處的大理石精雕，均為絕世之作。但隨著希臘的國運坎坷，這個藝術傑構也一如一個命運多舛的佳人，令人慨嘆。它在六世紀變成基督教東正教堂，十五世紀時鄂圖曼土耳其人占領，它又成為清真寺，並加蓋一個叫拜樓（尖塔）。一六八七年威尼斯人圍攻雅典，土耳其人把神廟當作火藥庫，曾經發生爆炸，而造成若干損燬。這種不能自保的古蹟和文

物，此時造成正處擴張的英國人的可乘之機。最後，這些巴特農神廟的大理石雕刻精品落入英國人額爾金勳爵（Thomas Bruce, or Lord Elgin, 1766-1841）之手。額爾金時任英國駐土耳其大使，他把這些大理石精品在一八〇二年至一八一一年間運至英國，聲言他自土耳其人手中拯救了文物。他把這些大理石精品當做私人收藏品，並於一八一六年賣給英國政府後轉交大英博物館，這便是大英博物館鎮館之寶的「額爾金大理石精品」（Elgin Marbles）的來由。但是，額爾金這種把別國文化財公然運往自己國家的行徑，導致後來出現一個新字，即額爾金作風（elginism），而且成爲世界性的字彙，法文爲elginisme，西班牙文爲elginismo，它指把別國文化財運往另一個國家，特別指從窮國運往富國。說到這裏，再講一點題外話。這位熱愛巴特農神廟文物的額爾金勳爵是英國世襲伯爵（Earl of Elgin）的第七代，他的兒子第八代額

爾金勳爵（James Bruce, Lord Elgin, 1811-1863），曾歷任英屬牙買加（Jamaica）和加拿大總督，他在一八五八～六〇間爲進攻中國的英、法聯軍之役的英國全權代表和英軍統帥，他在一八六〇年竟幹下焚燬圓明園的勾當，其格調不如乃父遠甚。不知是因爲不會乃父對藝術品的憐香惜玉？還是因爲文化衝突所致？

希臘當時因淪亡而在土耳其帝國的統治下，不能保持自己的文物。另一個國家不能自保也不能保有文化財寶的最近事例，是二〇〇三年美國進攻伊拉克，造成巴格達博物館很多珍寶文物的流失。我們的故宮在國難當中能夠繼續茁壯，當歸功於國家領導人的高瞻遠矚，以及全體工作人員的犧牲奉獻。第二次大戰期間和國內戰期間的兩次播遷，那一次的經過不是感人肺腑？

大英博物館收藏的中國文物亦有一定份量。這主要靠猶裔英國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該人在英國

和英印政府的支持下，他曾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五年間經中亞、波斯（伊朗）、俾路支、伊拉克、約旦，三次來新疆及甘肅挖寶。一九〇七年他穿越羅布泊，發現古代玉門關望樓遺址；到了甘肅敦煌千佛洞，進入千佛洞石室，盜走二十九箱精品（約合石室收藏三分之一強），此即引以爲傲的敦煌寶藏。一九三〇年又有第四次，但因國民政府禁止而未能完全盡興。他是敦煌盜寶的元兇，有「敦煌盜寶第一人」之稱，後來竟因敦煌盜寶之功而封爲爵士。我們有很多敦煌文物都經他手入大英博物館（小部分在印度新德里考古博物館），其中包括千佛洞的經文及敦煌西北部長城烽燧遺址挖得的大量漢簡。未入他魔掌的部分，後來多爲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取走，後存巴黎國立圖書館，這是爲什麼倫敦、巴黎二地成爲敦煌學研究中心的緣故。中國文物流入英國，固然在鴉片戰爭開始，甚至鴉片戰爭前即已



永樂大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開始；較大規模的掠奪，是英軍在一八六〇年自圓明園劫掠所得，其中一部分獻給維多利亞女王，另一部分被拍賣。獻給女王的部分，後來撥交大英博物館。

大致言之，大英博物館中有原屬中國的各種文物和器皿二萬三仟件，包括青銅、陶瓷

器、書畫、玉器、雕刻等，有許多為珍品及孤品，其中不乏乾隆皇帝所心愛者。書畫類中有名的，有晉代顧愷之〈女史箴圖〉（有謂係唐摹本），李思訓〈青綠山水圖〉，巨然〈茂林疊嶂圖〉，李公麟〈華嚴變相圖〉，范寬〈攜琴訪友圖〉，燕文貴〈群峰雪霽圖〉，蘇軾〈墨竹圖〉，馬遠〈山水舟遊圖〉等；青銅器中有商雙羊尊，西周康侯簋及邢侯簋。另外，還有珍貴文獻及古籍六萬多種，其中有中國的波羅密經最早版本，《永樂大典》四十五卷，以及甲骨片、竹簡、刻本古書、敦煌藏經（包括唐懿宗咸通九年，也就是西元八六八年木板印刷的《金剛經》），公認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以及一些地圖等。此外，還有許多畫在絹上或紙上的佛畫，是五世紀至十世紀的精品，至為寶貴。

在英國這種額爾金型和斯坦因型的人很多，他們巧取豪奪，手段不一而足，搜括天下至寶，豐富了大英博物館的館

藏。僅靠英國本土收藏家的努力，是不足以成就大英博物館後來的氣候的。

大英博物館建立於十八世紀中葉，大盛於十九世紀，這也是英國人擁有廣袤的大英帝國，舉世無敵的海權，以及強大的工業力量的時期，國內和平繁榮，國際上能發揮仲裁的力量。這個時期通稱為「英國時代」（Pax Britannica）。再加上英國人的奮勉，能夠「好古敏以求之」地收集文物，國家也有完善的管理制度，這些因素加起來，終能營造出大英博物館。簡單地說，沒有「大英帝國」，就沒有大英博物館。十九世紀起，美國亦奮起，二十世紀中葉以後，美國締造出「美國時代」（Pax Americana）的盛世，大美帝國（American Empire）也隨之出現。在美國也成就了一些世界級的博物館。

## 大英博物館面臨的大時代挑戰

博物館事業屬文化事業，

一切文化事業均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特性。這個說法與范仲淹的氣度無關，而是說文化事業總是在經濟繁榮、社會安和樂利、世界和平，以及國際政治安定以後，才慢慢地蒙受其利；而當上述因素惡化時，文化事業會最先蒙受其害。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全球進入另一個全新的大時代。在這個新的大時代裏，一切大英博物館賴以興起的條件，如英國為世界超強、英國國力（表現在GDP等各方面）為全球第一、從前受英國支配地區的民族主義（包括文化的民族主義）尚未抬頭等等，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在經費方面，大英博物館支出浩大，再進一步發展，常有困難。在它發展巔峰時期的十九世紀，英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為全球第一，現在降至第五位。它的經費，自一七五三年建館之時，即由英國國會立法（Act of Parliament）為公共機構，由政府的文化、



大英博物館2000年完成的大庭院（Great Court）

媒體和運動部 (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and Sports) 編列預算。但是，現在政府僅能負責其所需經費的百分之七十，其餘的百分之三十要自籌。大英博物館爲了籌募經費，祇好經營商店、餐廳，發起募捐，以及發展會員制 (現已有兩萬多名會員)。本來，以大英博物館參觀人數之眾，每年達數百萬人，如果收門票，也爲數不少，但自一八一〇年起它採取免費入場制度，祇有一九七二、七三年有幾個月，曾一度收取入場費。二〇〇二年，它曾面臨嚴重的財務危機，且曾被迫關閉了幾天。但是，它有時還是要排除萬難來擴建，如耗資一億四千五百萬美元在二〇〇〇年完成的大庭院 (Great Court)，是歐洲最大的有頂廣場，其頂部由一千六百五十六塊形狀奇異的玻璃所組成，爲一環繞大閱覽室 (曾經是馬克斯·孫中山、列寧、甘地等人用過的地方) 的大頂棚，由著名的建築師福斯特 (Norman Foster) 設計。但另一項要花費一億一千

八百萬美元的擴建計畫，已動用了一千七百萬美元，還是喊卡。

大英博物館今天遭受的最挑戰，是國際社會對於藝術帝國主義 (art imperialism) 的聲討和藝術品原屬國家對文物的追討。大家知道，「帝國主義」常被貼上各種不同的標籤以凸顯各種不同的指涉：靠武力征服以遂行目的，被稱爲軍事帝國主義 (military imperialism)；運用經濟、文化、社會等力量以伸張國家影響力的，則爲新帝國主義 (new imperialism)；掌控並運用資訊以醜化別國形象的，被稱爲資訊帝國主義 (information imperialism)；以人權爲號召而介入別國事務的，叫道德的帝國主義 (moral imperialism)。藝術帝國主義係運用各種手段取得別國文化資財的行爲。先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將在戰時在歐洲所掠十萬件以上的文物歸還原國。一九五四年海牙戰時保護文化財公約 (Hagu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爲一重大發展。一九五〇年代，國際間要求把文物歸還原屬國的運動方興未艾，蔚爲歸還運動 (Restitution Movement)。希臘一直希望收回額爾金大理石精品，而奈及利亞 (Nigeria) 對於貝寧青銅器 (Benin Bronzes) 的態度也甚爲堅定。其他文物被別國剝奪的國家也希望收回他們流落在外的國寶。一九八〇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成立一個由二十二國組成的一個「促進文化財產歸還原有國家之政府間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for Promoting the Return of Cultural Property to Its Countries of Origin or Its Restitution in Case of Illicit Appropriation)，以司理其事。同時，更多的相關公約次第簽訂。後來，一九八〇年代後期起，中國亦參與推動。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有太多國寶流失在外。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調查，目前在全球四十七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多個博物館

中，記錄在案的中國文物有一百六十七萬件，流落海外民間者十倍於此。中國除積極參與國際有關追討文物的活動以外，也依照其所參加簽署的兩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九八九年「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出口文物財產和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以及一九九五年「關於被盜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中國且為起草國之一），建立流失海外的國家珍貴文物信息數據庫。中國自二〇〇三年七月啓動國寶工程，成立中華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用購回、討還、捐贈三種方式進行，也收到若干效果，但距離預期目標尚甚遙遠。

各國追討流失文物在國際社會蔚為風氣，各世界級的博物館自然也有所反制。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包括大英博物館、羅浮宮、大都會博物館等在內的歐美十九家博物館發表聯合聲明，強調世界級博物館的重要和價值，反對將藝術品尤其是古代文物，交還原屬國。但是，他們所持的理由不

無從前「白種人的負擔」（White Man's Burden）的意味。這些國家也確實對這些文物的典藏、照顧和研究，作出過很多的貢獻；但是，他們要繼續保有的論點，不是喪失國寶的國家能夠接受的。烏干達（Uganda）的總統阿敏（Idi Amin, 1925-2003, 在位時期1971-79）會雇用白人抬他坐的轎，而戲稱為「白種人的負擔」。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經把有爭議的文物個個都做了身分識別（object-ID），看來最後很難善了。

這種風潮雖然目前尚未動搖大英博物館等這些世界級博物館的根本，但終究不能等閒視之，而且時間並不站在他們這一邊。關於這個問題，可參看 *Imperialism, Art and Restitution*, ed by John Henry Merryman, Stanford Univ. Press, 2006; Ana Filipa Vrdoljak, *International Law, Museums and the Return of Cultural Objects*, Cambridge Univ. Press, 2006.

## 結語

大英博物館氣象宏偉，典藏豐富。但是，因為它的興起有特殊背景及因素，其收藏品超過百分之九十不是英國自己所有而為取自海外地區者。如果一旦被迫歸還，便形同掏空而成為「真空」館。大英博物館固然可以用這些珍藏原為人類共同文化財產，它更能善盡保管者之責，以及涉及其國家法律等理由來阻擋和拖延追討的壓力。這些世界級博物館，如大英博物館，對於保全世界文物也不無貢獻。但這與個人關係中的「生育」及「養育」都是恩情，某種情況下「養育」更重於「生育」是不同的，因為有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這一關，而無法持續下去。直迄現在，大英博物館等全世界級的博物館還在挺著，但展望未來，這種瀰漫國際間力道愈來愈大的歸還運動，終不可小覷。大英博物館之類的世界級博物館能夠抗拒到什麼時候？它們最後有無可能要作某種妥協，例如交聯合國管理，或原



貝寧黃銅裝飾板  
約西元十六世紀 貝寧王朝  
奈及利亞 貝寧  
黃銅  
大英博物館藏



屬國與保管國各以真品及複製品輪流展覽（如今希臘和土耳其等國均有以複製品陳列且註明原委的做法），或者另外還有其他選擇，並非沒有可能。

另一方面，故宮博物院這

一個世界級的博物館，與其他世界級博物館相較之下，卻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其所藏文物及國寶係建立在明清兩代皇室收藏品的基礎上，再加上後來所得的東西，譬如現在也收集

當代人的傑出作品，不斷地注入新的生命，取精用宏，產權不容置疑。它不虧欠別人而祇有別人虧欠它，真是席豐履厚，永垂無疆，值得當作最大的文化財加以維護。